

只求为国 誓死抗倭

——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张研文

编者按：2003年5月26日，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张垣大地举起抗日义旗70周年纪念日。年初，市政协文史委与市文化局商定，5月组织全市各界人士在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后因“非典”肆虐活动未能如期举行。本辑特刊登文章，以志纪念。



冯玉祥将军向抗日同盟军讲话，鼓励官兵英勇杀敌。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支抗日军事力量的崛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经过密切接触、达成共识后，由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冯玉祥出面组织，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揭竿而起，在塞北草原上燃起抗日烽火。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南京多方奔走，呼吁抗战，并向政府提出议案，要求收复失地，支持第十九路军。但冯玉祥的活动和努力，均因蒋介石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而付之东流。为此，冯玉祥愤而离京，在泰山小住一时后，听

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建议，于 1932 年 10 月离泰山移住张家口，开始直接筹划组建抗日武装的活动。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在积极活动的同时，派人到北平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要求中共派人协助筹划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为此，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先行派出中共党员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前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做发动和组织工作。1933 年 1 月，为领导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开展兵运工作，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中央北方特科）与中共河北省委商定 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等人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 驻张家口 直属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领导 帮助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在该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3 年春，共产党在山西汾阳军校的地下党员赵力钧等也陆续被调到冯玉祥部开展工作。这些派去的共产党员与冯玉祥配合默契，深得冯玉祥的信任，抗日武装的筹建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当时，张家口及周围地区除第二十九军的一个留守团外，还驻有大量从东北及热河溃散而来的部队，主要是东北的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等的抗日义勇军 还有从热河退到察省的汤玉麟的部队及姚景川的热河地方部队，同时，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也驻在沙城一带。由于这些部队多因溃退而来 尽管人数有十数万人 但互不统属 各行其是 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经共产党与冯玉祥多方联络和耐心说服，多数部队表示拥护冯玉祥来领导进行抗日。一些爱国军人和志士得知冯玉祥组建抗日部队，便纷纷来归。原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率他的旧部鲍刚和张人杰的两个师，挥戈北上张家口。中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号召蒙汉青年

参加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变卖天津的家产携款到达张家口。冯玉祥在山西省汾阳军校的 3000 余名师生 在教务长、共产党员尹心田率领下也赶赴张家口，改编为抗日同盟军 1 个师。曾担任过骑兵师师长的张砺生从南方归来，组建起军队加入抗日同盟军。这样 汇集在冯玉祥抗日麾下的部队已达十万之众 创建抗日军队，树立抗日义旗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3 年 5 月 24 日，侵占多伦的日本侵略军及伪军向南推进 占领沽源 察哈尔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当此之际 汇集张家口各军各地代表，均感大敌当前，形势危急，应当奋起抗战。经过共产党与冯玉祥、吉鸿昌多次协商 集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5 月 26 日，张家口召开了有数千名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布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同时 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发出布告 表示了收复失地 坚决抗日的决心。布告称：“照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我国土 屠戮我军民 步步扩大 节节深入。现日军正图进踞平津 宣言将取张垣 华北全局甚危 察省首当其冲。玉祥僻居张垣数月 迭蒙本省、平、津、沪、粤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 文电星驰 责以大义 勉以抗日。丁兹艰危 敢不奋兴。兹以 5 月 26 日出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结合各路忠勇将士及爱国民众，实行武装 保卫察省 为争取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而奋斗。大难当前，义无反顾。本总司令以抗日救国为天职，民众御侮运动，镇压汉奸扰乱。希民众一致奋起 与本总司令一同抗日 革命大业 有厚望焉。”

同时 冯玉祥还向全国发出通电 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 收复失地。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不仅得到了张家口、察哈尔人民的热烈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抗日团体、社会名流、省市当局纷纷致电冯玉祥，对其表示支持和祝贺。全国知名人士朱庆澜在北平成立的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后援会还把在北平、上海等地募集到的 10 万元巨款送到张家口，以供冯玉祥作抗日经费。

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在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过程中，始终与冯玉祥保持了密切联系，并在先期派出萧明、吴化之、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到张家口开展抗日工作后，又派出张慕陶、宣侠父、邹春生等数十名共产党人到张以加强助冯的工作力量。同时，平津等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积极发动和组织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工人赶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并且还为抗日同盟军募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中共党员宣侠父和许权中分别担任五师和十八师师长。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大约有 300 余人。

此时，日伪军继续向南推进。6 月 1 日，日军飞机轰炸独石口。6 月 4 日攻占宝昌，6 月 5 日占领康保，而后沿张（北）康（保）大道向张北县进逼。面对日伪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冯玉祥采取紧急措施以应敌。命李忠义、张砺生、七玉岭等部开往张北拒敌，委派张凌云为赤城、龙关警备司令，率步兵一旅前往独石口扼险防守；另派张人杰师为后应。

6 月 15 日，冯玉祥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61 人，冯玉祥、王化三、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 9 人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在对抗日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其要点是：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

合战线 其宗旨是外抗暴日 内除国贼 武力收复失地 对日绝交 反对任何妥协 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共同奋斗 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 肃清汉奸卖国贼 实现民众政权 取消苛捐杂税 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的生活 释放爱国政治犯 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 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大会还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内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方面的事宜。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 35 名 候补委员 29 名 推选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慕陶等 11 人为常务委员。

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抗日同盟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工作任务 加强了领导机构 理顺了领导关系 在激发部队抗日情绪，增强相互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会后，冯玉祥对部队重新加以编制，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李忠义为右翼副总指挥 邓文为左翼副总指挥。同时还任命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 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阮玄武为第五军军长，李忠义为第十六军军长 黄守中为第十八军军长 邓文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孙良诚为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张砺生为察哈尔自卫军军长，方振武为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富春为第二十四师师长，马冠军为第二十五师师长。至此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建工作圆满完成 所部共约 10 万余人。

按照制定的军事行动计划，1933 年 6 月 20 日，吉鸿昌率卫队离张家口到达张北组织总指挥部。当晚，吉鸿昌、李忠义、邓文发表就职通电 再次表示“愿掷头颅 换取民族生存 挥我热血 收复大好河山”的决心。他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依

照计划 邓文的第五路军为左翼第一梯队 由左卫出发 经太师庄、水磨厂向张北县以北集结；李忠义的第十六军为右翼第二梯队 由万全县出发 经正北沟、北马厂向张北县以东阮庄一带集结 骑兵第三师为第三梯队 由张家口出发 经南天门、古石滩到张北县城集结。

抗日同盟军部署完毕，即首先向盘踞在康保的日伪军展开进攻，6月22日午后3时一举收复康保县城，残敌向宝昌逃窜。6月27日冯玉祥致电吉鸿昌：“察东民众水深火热 伐罪之举 未容稍缓”命其速率各部攻击宝昌。

当时宝昌驻有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的主力部队。日军在得知抗日同盟军攻克康保的消息后，急令伪军张海鹏调遣重兵支援宝昌，日军茂木骑兵旅团又援以大量武器装备，派出骡马千匹，日夜赶运接济。

而抗日同盟军此时却弹药奇缺，给养困难，部队有时一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加上连日阴雨，人马衣物尽被淋湿，冷饿交加，其困苦状况难以尽言。尽管如此，抗日同盟军将士凭其满腔热血，全力以赴，投入作战行动。6月30日，抗日同盟军主力逼近宝昌。7月1日与伪军主力在刘家营、柳条沟一带发生激战，至傍晚，将伪军主力击败，残敌弃城逃往多伦。抗日同盟军再克宝昌。此时，驻守沽源的伪军刘桂堂发表通电，宣告反正，沽源亦告收复。抗日同盟军乘胜向多伦挺进。

多伦，位于滦河上游，是察哈尔靠近热河边境的一个军事重镇。元朝时多伦属“上都”，明朝时属“开平卫”，清朝时多伦设多伦诺尔厅，是口北三厅之一，民国二年改多伦县。日军侵占多伦以后，即派茂木骑兵旅团和一个重炮队3000余人及伪军李守信部1万余人驻守这里。他们在城外构筑了32座八卦炮

台还在城内外修建了交通沟、电网等设施，将多伦建成了一个攻防兼备的战斗堡垒。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等3县之后，日军又将茂木骑兵旅团和义一第八师团作了重新部署，加强了多伦的防御力量。

7月7日，抗日同盟军分三路总攻多伦。中路李忠义部由黄土滩子一带发起攻击，左路张凌云部由黄土厂包抄敌军后背，右路刘桂堂部苏致广师由土窑洼截断敌军归路。吉鸿昌、邓文两部为总预备队，进驻前后孤山。

战斗打的异常激烈。日伪军凭借其坚固工事拼力死守，驻热河的铃木师团又派两队飞机前来助战。经日机轮番轰炸，抗日同盟军阵地被摧毁。多伦守敌乘机组织三次反扑。但由于抗日同盟军将士的顽强阻击，日伪军的反扑均遭失败，而同盟军也受到重大损失。7月8日，抗日同盟军再行攻击，夺敌壕两道。至9日凌晨，将日伪军在城外大部工事占领。日伪军退入城内继续坚守。9日晚，吉鸿昌组织敢死队全力攻城，“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但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火力猛烈，攻击未获成功。10日再攻，仍无功而返。11日，抗日同盟军选派40余名战士化装成伪军混入城内。12日，吉鸿昌亲率部队向多伦展开猛攻，在混入城内的抗日同盟军的配合下，终于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上午9时40分，抗日同盟军从南、西、北三门相继攻入城内，又经3个多小时的巷战，终将固守的敌军歼灭，余敌从东门逃往热河境内。至此，沦陷了70多天的多伦重镇终于被抗日同盟军将士收复。当天12时许，抗日同盟军列队开进城内。多伦各族群众扶老携幼，涌上街头，热烈欢迎英勇善战的抗日同盟军将士。

从6月20日抗日同盟军正式展开北征的军事行动开始，

在短短的 20 余天的时间里，抗日同盟军便将陷落敌手的察东 4 县全部收复，将侵入察哈尔的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境域。这次胜利是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由民众抗日武装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果。同时，抗日同盟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整个战役中，抗日同盟军共伤亡官兵 1600 余人，其中阵亡 312 人，负伤 1380 人。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消息传到张家口，全城顿时沸腾起来。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共同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抗日同盟军察省大捷，也一扫‘九·一八’以来抗战的沉闷气氛，使全国军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中，有的赞誉冯玉祥‘肩起抗日救国之责，全国民众，曷胜欣慰’，有的称赞抗日同盟军‘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欢呼抗日同盟军抗敌大捷‘扬我国光，奋我国威’，希望抗日同盟军‘再接再厉，直捣黄龙，复我河山’。就连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程潜、李济深、蔡廷锴、李烈钧、蒋光鼎等，也要求汪精卫、蒋介石对冯玉祥要‘奖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其军旅，受以重权，升以大任’。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人心向背，皆以抗日救亡为基准。冯玉祥顺应大势，高举义旗，逆政府意愿，做国人想做而未



抗日同盟军开赴前线。

能做之事，从而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同时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军事大捷 在全国还促成了一次新的抗日高潮，它不仅在当时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人心士气，而且对其后开展的全民抗战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张家口广大人民对冯玉祥开展抗日活动给予了极大支持。作为贫瘠之地的张家口，广大群众的生活原本就十分困苦。而当十数万抗日大军齐聚张家口之后，仅部队吃饭问题就是一大负担。但广大群众多方想尽办法 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方便。当抗日同盟军取得收复察东 4县的胜利之后 张家口人民更是欣喜若狂 他们很快募集了 3 大卡车的慰问物资 并派代表亲送多伦前线，向劳苦功高的抗日同盟军表示慰问和敬意。7月15日，数万名军民又在上堡体育场召开了张家口军民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广大与会群众表示了支持抗日同盟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张家口商民代表还在大会上表示，商务会就是抗日同盟军最大的军需库 商民愿意贡献一切 要麸有麸 要面给面。

张家口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令冯玉祥十分感动。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亲任委员长。冯玉祥在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郑重表示，要收复东北四省 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 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全国爱国志士“多方赞助 共图进行”。

但是，尽管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和拥护，尽管抗日同盟军取得了收复察东 4县 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重大胜利，然而冯玉祥及抗日同盟军的一切活动均受到了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仇视，他们竭尽所能，对张家口军民的抗日活动进行一系列的干扰破坏。6月4日，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头目鲁涤平在会议上攻击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是欺世盗名，故意与中央为难。6月5日国民党华北12个党部在河北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并联名发表通电，为冯玉祥罗织了“假立名号 弄兵自娱 更置职官 夺取军队 招集亡命，勒征民财 拘捕党员 封闭党部 虚构事实 诋诬中央”等等一大堆罪名。6月8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更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污蔑冯玉祥 冒名抗日 勾结汉奸 割据地盘 捕杀党委 驱逐政府 任命官吏 并宣传共产 实行赤化 显系背叛党国 反抗中央”。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面对不抵抗主义者的舆论围剿，冯玉祥于6月11日向全国发表通电，据理力驳造谣者的攻击和诬蔑，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抗日到底的心志。

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不遗余力地攻击和诬蔑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冯玉祥的活动违背了他们制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容忍冯玉祥的这种“离经叛道”行为，更将军民自发的抗日活动视为大逆不道，有碍于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自身利益，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反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了。为了达到阻止、瓦解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抗日活动的目的，蒋介石之流不仅采取造谣诬蔑、舆论围剿的手段，而且还采取封官许愿、金钱利诱的方法。

早在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开始不久，蒋介石便亲笔修书致冯玉祥，邀其“晋京共商抗日大计”。并派内政部长黄绍雄到张家口进行游说。同时，还放出风说，冯玉祥要到南京出任某种要职，以混淆视听。尽管蒋介石竭力拉拢冯玉祥，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自己始终以抗日拼命为目的，个人不

需要任何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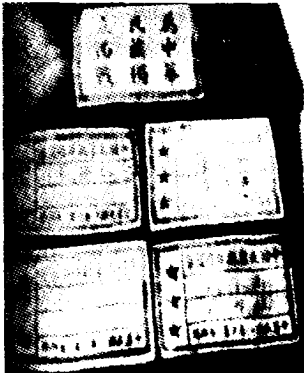
蒋介石拉拢冯玉祥的企图失败之后，便将目光转向当时集结在张家口实力较强的一些部队将领身上。当时，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从热河退至沙城一带，由于其跑得快，部队未遭大的损失，故在张家口的部队中，其力量还算强大。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最初也表示支持冯玉祥抗日。而蒋介石在委以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团办的官职并赠其 50 万巨款之后，孙殿英便马上改变腔调，大放“宁死不参加内战”的厥词，并率军西开，让开了沙城、新保安等通往张家口的重要阵地。蒋介石在孙殿英处得手之后，进一步将手伸向抗日同盟军内部。他派人拉拢方振武的属下鲍刚、张人杰，委任鲍刚为旅长，并拨发军费。鲍刚首先拉上队伍离开了抗日同盟军。张人杰亦与蒋介石方面互有默契。另外，蒋介石还对抗日同盟军其他一些将领如冯占海、邓文等进行拉拢利诱，造成了这些将领的动摇，从而使抗日同盟军出现了混乱。

蒋介石在拉拢分化抗日同盟军的同时，还加紧调动部队，准备以武力镇压抗日同盟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的部队自 7 月 8 日起开至怀来附近集结待命。7 月 17 日，庞炳勋部之骑兵李福和师进逼至下花园，与抗日同盟军的前哨相距仅仅 6 公里。此后，蒋介石又陆续将王以哲、黄杰、王敬久等 5 个师调入察哈尔。至 7 月底，国民党已在察哈尔集结重兵计 16 个整师，共 15 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为进攻察哈尔的部队配备了铁甲列车 8 列，飞机 2 队，大有必欲将抗日同盟军置之死地的气势。国民党重兵压境，使察哈尔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内战可谓一触即发。

7 月 31 日，蒋介石下令入察中央军封锁断绝下花园、柴沟



堡两处的铁路交通，使张家口顿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不仅外界的物资中断供应就是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原本计划送至平津治疗的伤员也难以输送。这种状况使本来就粮饷不足、缺医少药的抗日同盟军顿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



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印章
(上)和将士胸章(下)

在此情况下，抗日同盟军军心不稳，内部出现重大分化。首先冯占海被何应钦收买，将部队拉到蔚县，脱离了抗日同盟军。而后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又在妓院被杀，其属下檀自新将部队拉走投靠了何应钦。冯、檀两人叛离后，李忠义、张人杰也先后拉走了队伍，投入了何应钦的怀抱。这些部队的叛离，不仅极大地削弱了抗日同盟军的实力，更主要的是在抗日同盟军中造成了极大混乱，严重影响了抗日同盟军的军心士气，使抗日同盟军的处境更加不利。

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严重挫伤了冯玉祥坚持抗日的决心。8月12日，冯玉祥主持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全国民众抗日死难烈士祠落成典礼。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修建纪念塔和烈士祠是要在张家口留一永久纪念，以证明收复察东是由许多将士之血肉换来的。并表明举办这个典礼仪式，既是追念既往，同时亦用以告别张垣各界。8月14日晨4时，冯玉祥告别了张家口，乘火车经北平转

丰台南下。冯玉祥离察后，拒绝了南京政府拟议的诸多职务安排，重返泰山五贤祠，再度“读书生涯”。

冯玉祥辞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并离开张家口后，方振武、吉鸿昌表示不撤盟，不倒旗，坚决抗日到底。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1933年9月初，抗日同盟军余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树立抗日讨蒋的旗帜。并决定从独石口南下，进攻北平，还提出了“打到北平过中秋”的口号。9月20日，方振武率部攻占怀柔县城，21日再克密云。23日，方、吉所部进入顺义县境内的牛栏山地区，26日率部向北平进发。方振武、吉鸿昌的军事行动使北平的何应钦、黄郛等大为惊慌，急忙宣布在北平实行戒严，并紧急调集部队对方、吉部队进行阻截。同时，他们又与日本大使馆频频接触，商议共同围剿抗日同盟军。而后，日本军队以执行《塘沽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线”之规定为借口，在顺义、怀柔、密云等地布下重兵，配合国民党堵击抗日同盟军。10月初，抗日同盟军迂回至高丽营、大小汤山、十三陵一带。其间，日本飞机不断对抗日同盟军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亦加强了军力和攻势。方振武、吉鸿昌虽率部进行殊死抵抗，然而由于双方兵力过分悬殊，以至部队遭受重大伤亡。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所率部队只剩两三千人，且弹尽粮绝，被国民党及日本军队团团围在牛栏山，已失去了抵抗能力。为了保留这仅有的一点抗日力量，避免无畏的牺牲，方振武、吉鸿昌被迫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联系，表示同意接受改编。战事停止以后，方振武、吉鸿昌在被押往北平的途中寻机逃走。吉鸿昌避入天津租界，方振武辗转到达香

港。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脱险潜入天津租界的吉鸿昌，身处逆境 斗志不减 不仅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筹备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 和宣侠父共同编辑出版《民族战旗》 并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然而由于行事不慎，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旋被解往北平陆军监狱。在审讯中 吉鸿昌大义凛然 怒斥蒋介石政府卖国殃民、残内媚外的种种罪行，使审讯他的何应钦之流受到了一次共产党人主持的正义审判。何应钦恼羞成怒 公然罗织罪名 将吉鸿昌杀害。吉鸿昌就义前 慷慨从容 含笑执笔 写下了一首留传后世的诗句：“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铁骨铮言，浩然正气。吉鸿昌以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 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万分敬仰。他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与世长存。

（节选自耿双全主编《中共张家口地方史》第一卷）



抗日同盟军在民众热烈欢迎下进入多伦城。

忆抗日同盟军从交通银行 提军马款事

杜天相

1933年5月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一日同盟军获悉：张家口交通银行存有一笔友军买马汇款，原为张学良拨付刘翼飞骑兵旅购战马用。1933年6月 吉鸿昌派员来交通银行 洽谈提款事宜。行长祁某 人称七爷（满族贵裔）闻讯，惶惶夜遁回京。行前 命其兄出纳股长祁六爷翌早上班 转告会计主任、先父杜赓克暂代行长。时我读初小四年级，已十岁 对此事印象颇深。常听父母密谈 虽不详尽 但尚粗知大要。先父先后接待同盟军代表数人，多次反复商讨。来人先宣传该军宗旨 并称已接管省政府与驻军防务 理应提取此笔军费 以供军需。先父称 按银行成规 非原收款人或收款单位不得提取此款 以免错付或冒领 以维护客户利益。来人云 你既受权代理 即有权支付。现敌军压境 凡有爱国良心者 理应通融照付，不得拒绝搪塞 贻误军机。现祁行长已外逃 你不得离张。先父讲 可令原收款单位来行提现 转交你军。来说：“他要肯来，我何必找你洽商。”先父又说：“由原单位书面委托你军代办取款亦可。”后此事又因“当家人不在，在家的当不了家”而作罢。为提此款 吉军屡屡派员前来 但都无功而返。出乎先父意

料的是，一日吉鸿昌将军竟亲自驾临面谈。先父又重述了对同盟军之看法，并表述了钦佩之意。并真诚表示：甚愿照付此款，奈难擅自作主，爱莫能助，尚祈见谅。如蒙同意，当即密电上级说明张垣形势与贵军对收复失地的把握，并请求支付。吉将军态度详和，耐心聆听，不时首肯，表示同盟军乃民众抗日之师，由民众组成，且保护民众，为民众所支持，讲政策，遵法纪，保境安民，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经营。今日洽谈提款事，是取之有道，用之于抗日军需，恰如好钢用在刀刃上。吉将军还对当时形势、战事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军作战有勇有谋，经验丰富，多伦地形易攻难守，不日出兵，稳操胜算。收复察省失地，指日可待。有同盟军在，你们尽可安心营业，不必考虑撤离。我军有把握，绝不会让察哈尔陷于敌手。听此一席话，先父表示立即将此意电告上级行。幸有贵军能御敌制胜，实乃民之福。建议并相信上级很可能会批准付款的。不久，交通银行密电到，批准由同盟军负责人签收提款。同盟军代表对此态甚表感谢。经历二十来天，此事终于解决。据我所知，抗日同盟军出师察北、察东五县前，用此款给将士发了第一次军饷。六月下旬，吉将军赴张北前线，十天即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苦战五昼夜，攻克多伦，毙敌千余名。二十天收复察北东五县失地，捷报频传，人心大快，张垣庆祝，举国欢欣。

后来我又知悉：交通银行对擅自逃离，失职失责的原行长祁某，宣布开除。先父杜赓尧临危受命，因应对有方，及时请示报告危城动态，办事处理得当，被晋升为行长。8月20日，宋哲元率29军抵张家口，就任察省主席后，四年间地方安靖。先父积极创业，先后开设了宣化、集宁、山西大同三个交行办事处和一个仓库（货栈），营业额激增，张家口行晋级为四等支行编制。

“七七事变”后 国民党 49 军弃守察省，张家口交行全体员工及眷属奉命于铁路停驶前乘末班车并将库存白银、账簿、档案撤往山西 不动产 家俱、宿舍 为伪蒙疆银行占有。当然 这是后话了。



右图吉鸿昌向全体将士发表“有贼无我，有我无贼”的讲话 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 镇压抗日的阴谋。

左图为吉鸿昌率军整装待发。